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俄]托尔斯泰 著 宋蜀碧 徐迟 译

# 不可让渡的审判

托尔斯泰人心天堂焦虑集

Leo Tolstoy

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文豪，从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不可让渡的审判  
托尔斯泰人心天堂焦虑集

*Leo Tolstoy*

[俄] 托尔斯泰 著

宋蜀碧 徐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可让渡的审判：托尔斯泰人心天堂焦虑集 / (俄罗  
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宋蜀碧，徐迟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

(醒客悦读)

ISBN 978 - 7 - 201 - 06082 - 8

I. 不… II. ①托… ②宋… ③徐… III. 托尔斯泰，L. N.  
(1828~1910) —人生哲学—文集 IV. B8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684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 不可让渡的审判：托尔斯泰人心天堂焦虑集

---

作 者 [俄] 托尔斯泰  
译 者 宋蜀碧 徐迟  
丛 书 策 划 陈德中  
责 任 编 辑 马晓雪  
特 约 编 辑 逸井 明辉  
装 帧 设 计 高海云  
插 画 谢驭飞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 版 发 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6082 - 8  
定 价 22.00 元

---

## 总序 醒客宣言

周国平

“醒客悦读文库”从西方人文经典译著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作者分册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颇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曾为之作序。现在，第一批18种已出，第二批也即出，我很乐意做进一步的推荐。

丛书名“醒客悦读”的英文是 Thinker Readings，把 Thinker（思想者）译作“醒客”，是音义两恰的妙译。我尝戏言：我来给你们写一篇《醒客宣言》，号召“全世界醒客联合起来”。当然，这只是戏言。思想者是安静的，何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思想者也寻求同道，但不是靠呐喊。在庄严的图书馆里，在夜读者的灯光下，在超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中，醒客的联合一直在进行着，未尝有过间断。

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

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痛苦的。但是，做一个醒客，自有其清醒中的幸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有言：幸福与满足是两回事，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品质更高，内容更丰富，但唯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能思想。在上天赋予人的诸般能力中，最特别、最宝贵的就是思想的能力。赫拉克利特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这其实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共识。在巴门尼德笔下，太阳车载着思想者行进在光明大道上，而不思想者则始终停留在黑暗之中。亚里士多德视沉思活动为完美的幸福，因为它最为自足，不依赖于外部条件，就此而论最接近神的活动。帕斯卡尔把人譬作一枝会思想的芦苇，人纵然是脆弱的生命，却因思想而区别于其他一切生

命。笛卡儿干脆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或许可以引伸说，一个人唯有充分运用了上天赋予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作为人而存在。爱因斯坦把独立思考的能力称做“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人因此而获得了内在的自由，能够不受权力、社会偏见以及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支配。质言之，思想是人之为人的高级属性，思想的快乐是享受人的高级属性的快乐。一个人一旦深尝到这种快乐，再也改不掉思想的习惯，他就成了一个思想者，从此以后，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

在醒客的快乐中，一项莫大的快乐是阅读人文经典。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些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个伟大的传统，而人文经典则是这个传统的主要载体。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扎根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至深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在不同时代的个人的心灵中抽出新芽。卡尔维诺列举经典作品的特征，有两点最为精辟：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阅读经典之妙趣，正在于发现和重温的双重喜悦。

思想离不开传统。置身于传统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思想者。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精神传统中去，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传统一开始是外在于他的，他必须去把它“占为已有”，而阅读经典便是“占为已有”的最基本的途径。

这么说来，阅读经典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醒客的必由之路了。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未必总是艰难跋涉，也完全可以轻松漫步。林语堂曾经戏言：大师带学生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抽着大烟斗闲聊，烟雾缭绕中就把学生熏陶出来了。现在这套丛书正像是一个沙龙，让你听大师们聊天，并且逐渐加入他们的聊天，在快乐阅读中成为一个幸福的醒客。

阅读经典，就是在今天成为一个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我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尽兴品尝思想的快乐。

2007年11月7日

## 前言：精神领袖的莫名焦虑

张聪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三大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更是为他赢得了“世界文学泰斗”的崇高荣誉。托尔斯泰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此后他一直积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有六十年之久。他炯炯的目光一直专注于俄国的现实，他的思潮也一直在为求取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各种迫切问题而起伏萦回。托尔斯泰一生的思想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的反映，也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过程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182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在

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今属图拉省晓金区）。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远祖在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以中校头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高贵的门族，成为他日后一系列文学作品中众多人物的原型。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1841 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1844 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后转学法律。他的专业并不优秀，却对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一时期，他逐渐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学校教育产生不满情绪，最终在三年后退学，回到故乡经营田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家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大部分作品也是在这里完成。1851 年 4 月底，因对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厌倦，托尔斯泰随长兄尼古拉投戎，以志愿兵身份参加高加索战役，后又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在多次战役中，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与优秀品质，以及当地淳朴的生活习惯深深地感染了这个年轻人，使他对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更加不满，

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青年托尔斯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在 1851 年 7 月 3 日的日记里写道：“明天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里所说的创作计划就是其第一部作品《童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的簇新的生活里、在惊心动魄的危险战斗中、在一意要发现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少年》和《青年》，组成自传性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和对创作的探索。三部曲描写一个贵族青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种种内心感受，显示了托尔斯泰天才的心理分析才能。小说的主人公尼古林卡出生在贵族家庭，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和分析自己，对家庭和社会有着独特的观察和思考。随着他精神生活的逐渐发展，他原来的那个美好和谐的儿童世界逐渐破裂，他发现了现实中许多令人痛苦的人和事。他的亲人以及自己所存在的缺点使他感到失望，现实的表里不一、人们的虚伪尤其使他痛苦不安。道德上的纯洁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为叙述尼古林卡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时代增添了不少光彩。在书中，主人公如同湖水般清澈的道德情感表现在他对生活的热烈向往之上，也隐含在他对虚伪、琐碎的东西的弃绝之中。

此后，托尔斯泰又根据自己多年前在庄园实行“农事改革”的亲身体验写成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

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同时也是作者心灵探索和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农民们的愚钝、他们的不信任以及作者当时想变革的计划的无可奈何的流产，都被作者一一细致地描写出来。小说主人公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退学后回到自己的庄园。他见到农民的赤贫和困苦极为同情，便着手改善他们的处境。但农民们对此并不理解，他们一直猜疑老爷的“善言”背后掩盖着怎样自私的目的和阴险的打算，因而没有接受聂赫留朵夫的恩惠。这位青年地主对于农民在千百年来的压迫生活中形成的对地主阶级的敌意感到无可奈何。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贫困悲惨的生活状况，正确地表现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托尔斯泰一方面同情农民，另一方面又为贵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恼。

《童年》、《少年》和《青年》三部曲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后取得了极好的评价，评论家们纷纷猜测这个署名为“列·尼”的作家究竟是何许人物。1855年11月，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其他人视为怪人，他不喜欢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已。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并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

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在 1859 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 年底以中尉头衔退役后，托尔斯泰于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他一方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矛盾，一方面却无法找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

对于 50 至 60 年代之交的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又为地主面临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及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 年长兄尼古拉逝世，这一变故更加深了托尔斯泰的悲观情绪。1859 至 1862 年间他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

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 20 多所学校，开始深入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并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1860 至 1861 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期间他结识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了普鲁东，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 年 7 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日后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托尔斯泰写作近十年的中篇小说《哥萨克》的发表为他赢得了更高的荣誉。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跟贵族阶级决裂的意向。作家把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和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加以对比，把都市资产阶级文明和哥萨克人的淳朴观念加以对比，否定前者而赞美后者，发出了贵族“平民化”的呼吁。他在 1857 年 4 月的笔记里这样写道：“俄国的未来是哥萨克——是自由、平等和人人服义务兵役。”他从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中看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

生活方式的影子。作家生动地描写了普通的老百姓，描写了独特的哥萨克世界，“在这片土地肥沃、草木茂盛的林地上，自古以来，就住着英俊、勇敢而富裕的俄罗斯族人，他们信奉旧教，被称为高地哥萨克人”。大自然在托尔斯泰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没有像在这部小说中一样，在艺术结构和叙述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美丽的画面贯穿着内心的自由、纯洁、明朗感以及人的日常生活的欢乐感，这些实际上就是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已经初步显露了自己的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时指出，作者才华的两个特点是心理分析和道德感情的纯洁。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从他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进行着艰苦的思想探索，他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不满俄国贵族社会，也厌倦资本主义，他在自己的心中描画了理想而和谐的“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却始终无法找到正确的出路。

早在 1856 年夏至 1857 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短暂的恋爱经历促使他后来写成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的小说《家庭幸福》。1862 年 9 月，继

承爵位的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更是他文学创作上幽密的合作者。新婚之后，俄国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在60年代和70年代，托尔斯泰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的成果，也是作家自己多年思想探索的真实写照。

从1863年起他以六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场面浩大、人物繁多，问世至今，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评论家评论这部小说道：“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这部书从1863年开始构思，到1869年完成，为时约六年。越到创作过程的后期，作家越加同自己的主人公、

同他们的生活、同那个时代的气息和情绪神驰意会。

托尔斯泰的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着重描述的是四个贵族之家及其相互关系。他把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则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他们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这类贵族的代表人物是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他们两人毕生都在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艰苦，后来又都从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背离通行的社会准则的情况在安德烈和彼埃尔的生活史和心理演变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但这类行为并不仅仅只是背离，更多的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热情探索。托尔斯泰没有描写这两位主人公思想发展的所有阶段，读者同他们见面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已感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种内在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小说的开头好像还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同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缺陷的深刻认识结合，但这已经足够形成矛盾，并且成为两个年轻人进行社会探索和生命探索的出发点。

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所进行的探索的真正实质，在于用独特的方式对全部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热情

和深刻的检验。托尔斯泰让自己的主人公经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对于人们社会生活中最有兴趣和最具有意义的东西的迷恋。这些迷恋经常给他们带来痛苦和失望。“有意义的东西”常常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真正的价值，许多生活原则的正确性和稳定性的信念都是作为谬误而被揭露出来的。彼埃尔爱作“虚幻的、抽象的推论”，给人的印象是个淳朴羞怯的孩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一直在探讨一种道德的理想，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的生活。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信仰过雅各宾党人，崇拜过拿破仑，后来又变成无信仰。参加共济会，被它的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教义所吸引，可后来却发现这个组织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高尚纯洁。他怀着真诚的动机改善农民的处境，却遭到总管们和富裕农民的欺骗，真正贫困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彼埃尔的一切尝试和探求都以失败告终，他一度沉湎于酒宴，想借此摆脱精神上的苦恼。此时，农民出身的有宗法制思想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到处都有“上帝的判决”、人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应顺从地接受等等思想使彼埃尔似乎发现了真理。可事实上这也并不是什么真理，所以托尔斯泰最终还是让他摆脱了卡拉达耶夫思想的影响，在与人民的合作中找到人生的真谛。在托尔斯泰看来，彼埃尔的探索——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同《童年》、《少年》和《青年》的主人公所关心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他